

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之八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

序言、文献史料和研究著作概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筹备组编印

1979.8.呼和浩特

编 印 说 明

1966年至1969年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了他们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独自编纂的第一部通史，出版后很快被译成俄、英等外文，在国际蒙古史研究界产生过一定影响。为了使这部书及早与我国蒙古史研究界见面，我室曾约请本校陈乃雄、满达夫、鲁青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分卷开始翻译这部书。兹值召开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先将所译各卷序言、文献史料和研究著作概述以及目录部分编印出来，提供给参加会议的同志们，作为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史研究状况的一份参考资料。因为决定仓促，三卷之间的译名术语未及做到完全统一，有待以后在通稿中去解决。顺便也请同志们对译文提出宝贵意见。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1979年7月15日

1979/5/15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 第一卷

（从远古到17世纪）

序言、文献史料和研究著作概述

陈 乃 雄 译

目 次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一卷序言·····	(1)
从远古到17世纪蒙古的文献史料和研究著作概述·····	(4)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一卷目录·····	(30)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二卷序言·····	(35)
17—20世纪蒙古的文献史料和研究著作概述·····	(37)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二卷目录·····	(57)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三卷序言·····	(61)
1921—1966年蒙古的文献史料和著作概述·····	(63)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三卷目录·····	(87)

序 言

蒙古民族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痕迹的亚洲古老民族之一。我们的祖先从古以来占有自己的故土，两千年前就建立了国家，具有多次奋起反抗外来的和内部的压迫者，保卫独立自由的斗争历史。

蒙古人民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解放思想影响下，在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中站立起来，靠着人民革命党的领导，靠着英雄的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援助，于1921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从而开创了在我们祖国悠久的历史中引起根本转折的光辉的新时代。

在亚洲诸民族中首先摆脱殖民主义封建压迫，获得自由独立的我国人民的革命体制的历史，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不但对蒙古人民具有教育作用，而且还具有国际意义。

IO. 泽登巴尔同志写道：“亚非拉各国，在某种程度上都以蒙古这个从经济落后状态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为典范。把我国的好经验变成其他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进而那怕稍微加速一点他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好，这确实是蒙古人民的民族骄傲。”

对于蒙古历史的研究，开始于一百多年以前。许多国家的蒙古学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重要论述，其中俄国学者们的作品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十九世纪西方某些历史学家把成吉思汗为首的封建征服者们所挑起的凶残的冒险行为解释成好像是蒙古人的天性，这事实上就把那些征服者的过错强加在人民的头上了。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里，千方百计地想为帝国主义掠夺和侵占别人土地的反动政策辩解的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家，对于蒙古的征服战争和蒙古帝国的历史作了过分的赞扬，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样地歪曲蒙古人民的历史，在贬低历史上人民群众的作用的同时，一直到今天，还把游牧民族的历史看作好像是没有发展，没有进步，老在原地徘徊，停滞不前的。但是，无可辩驳的发展规律，表明了那样的反动观点乃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蒙古人民的历史，整个说来，是一部不断向前发展而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旧时代的蒙古历史家们在研究祖国的历史时，虽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成了重要的宝贵资料的书籍。但是那些历史家大多是统治阶级权利的表现者，因此他们主要写的是王公活佛的政教史传。

在我国，对于蒙古人民的历史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从1921年革命胜利之后开始的。

我国的历史家们在人民革命的年代里，在收集作为研究本国历史的可靠资料的书籍档案，探寻、登记、保护和考察存在于我国土地上的历史遗物的同时，把主要的注意力

放在研究生产物质财富的人民的历史上。

苏联的历史科学给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以良好的影响。

我国历史家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学的角度对蒙古人民的历史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第一项高质量的成果，是同苏联的历史家合著的，出版于1954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

我国历史家们的又一项重大成果是对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的编纂。党史的出版，对于用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法则的知识武装全体劳动者，把他们教育成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加积极地为我国彻底建成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自觉战士，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历史家的队伍有很大的发展，广泛地开展了考古研究，发表原著，就蒙古史的关键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著作。

我国的历史家们从1961年起开始着手编著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经过五年来的努力，这项工作已经完成。

在编著三卷本时，以历史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学为准则，综合世界蒙古学研究中的现代成就，尽可能广泛利用所获得的可靠资料和发现，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社会经济制度、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和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上。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三卷本的第一卷包括了二十万年前我们这个地区有原始人居住时起一直到十七世纪初的历史，也就是蒙古的古代史和封建主义在我们这个地区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和中期的历史。第二卷包括了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也就是蒙古地区处在满洲统治之下，封建主义日趋衰微的后期，以及1911年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成立的蒙古君主国的历史。第三卷包括了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取得胜利的1921年人民革命和我国从封建主义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代的 历史。

这里提请读者鉴核的，是三卷本通史中的第一卷。著者们在第一卷中力图作到既让蒙古人民的历史服从于全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的个性和特点。

如果说以前在写蒙古史时，从我国土地上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是我国有人居住的最早凭证的话，那么由于蒙苏学者们联合进行的科学考察，我们已经发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使得蒙古在那时已有人类的祖先居住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

著者们力图提出一些诸如随着蒙古地方氏族制度瓦解的深化，出现了部落联盟，出现了封建前和早期封建主义性质的国家，慢慢地产生封建生产关系，及这种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发展的问題。

古代的蒙古社会虽然产生过奴隶占有制，但是由于它缺少发展到社会经济形态的水平所需的条件，仅仅作为一种方式存在过而已，所以蒙古地方事实上是从氏族制度经历复杂而又漫长的过渡时期发展进入封建主义阶级社会的。

由于早期封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的生产方式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为进一步形成蒙古民族提供了条件。

蒙古的封建主义虽然具有依赖游牧经济而发展的特征，但是蒙古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同定居的农业国家一样，是封建土地（牧场）的所有制。由于作为游牧民生活基础的畜群是生产资料的又一重要部分，所以在阐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时，考虑到了土地和牲畜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强大的游牧民族的汗国，不止一次地在蒙古地方崛起。在那个时代里，统治阶级，尤其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征伐和掠夺过别的国家。这不仅给被侵占的国家，而且也给蒙古本国的正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障碍，使人民群众长年累月创造的经济文化财富受到摧残和破坏。对于这些恶果，著者们努力予以阐明。

著者们特别注意适当地阐明作为祖国命运决定因素的人民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致力于评价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并尽可能地广泛叙述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和物质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等等。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一卷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从远古到蒙古古代诸国的历史；第二部分包括从十二世纪上半叶到十七世纪的历史。每一部分又分为若干篇章。

※ ※ ※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三卷本第一卷是由下列著者撰写的：

（一）单独撰写的

- III·毕拉 第二部分第三篇第六、第七章，第四篇第四章
- II·多尔济苏荣 第一部分第二篇第一章，第五章第三节
- H·伊西扎木楚 第一部分第二篇第五章（除第三节以外各节）；第二部分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篇第二、第四、第五章
- III·那楚克多尔济 第二部分第一篇第二、第三章，第二篇第一章，第三篇第三章，第四篇第一、第二、第三章
- X·普日勒 文献史料和研究著作概述；第一部分第二篇第三、第六章；第二部分第一篇第一章
- H·斯日一敖德扎布 第一部分第一篇第一、第二章，第二篇第四章

（二）合作撰写的

- III·那楚克多尔济，II·多尔济苏荣
第一部分第二篇第二章
- H·伊西扎木楚，II·达莱
第二部分第三篇第一章

第一卷的文献史料和研究著作书目是由II·贡郭日和II·多尔济合编的；历史年表是由M·桑吉多尔济和H·斯日一敖德扎布合编的；地图是由O·普日布绘制的。

II·杭德苏荣对第一卷所用汉文和日文著作中的材料，拿原文进行了核对。

谨向在编写本书过程中给予资料上的支援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提供宝贵意见的所有单位和学者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65年

从远古到17世纪蒙古的 文献史料和研究著作概述

能够阐明蒙古民族各个历史时期情况的资料和著作，为数是很多的。

关于蒙古历史的书籍，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部分：一，文献史料；二，研究著作。

第一部分包括记载了历史事件的原始报导而被保存下来的文字遗物、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的笔录以及国家的法律和决议；第二部分包括根据原始史料写成的各种著作。

史料，也可以按实物的和文字的，区分为两类。

实物史料或文物不但对于研究文字产生之前的远古历史是极其重要的，就是对于研究文字产生之后的古代和中世纪时代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也是十分珍贵的。

与实物史料有关的考古资料被分为三类：一，作为原始人住所遗迹的居地废墟、城市废墟和残垣断壁；二，有关墓葬的文物；三，平时发现的各种物品。

依据考古资料，可以回溯过去各个时期生活的情况，描述古代部落、部族、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阶段以及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

墓葬的习惯不仅可以阐明宗教和风尚，而且也是阐明人民生活习俗、经济社会关系的性质的资料。同时，它又是鉴定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资料。

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土上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是研究自古居住在蒙古地方的部落、部族、民族，特别是研究蒙古人祖先的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文化的，具有极其宝贵的学术价值的凭证。

—

蒙古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因此，在蒙古的土地上保存了许许多多同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和早期国家的建立、兴盛和衰亡时期有关的遗物。蒙古拥有从人类最初的劳动工具——石器时代，一直到封建割据——十七世纪为止的许多世纪的极为丰富的遗物，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知。俄罗斯著名学者И.К.科兹洛夫在研究了蒙古考古遗物之后写道：“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地上和地下拥有这么多种类的丰富的文化遗物。”^①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蒙古地方的考古遗物进行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这一开端，使得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对于研究蒙古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俄罗斯学者Н.М.雅德林采夫从鄂尔浑河找到了一块不解的古突厥碑铭，探访了曾是蒙古国都的哈刺和林城的遗

址，写了一篇学术报告。人们认为，从那时起，开始了蒙古的考古研究。^④

1891年（按1954年俄文版和1955年蒙文版《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一卷本中均作“1890年”——陈乃雄注）俄国科学院派遣以B.B.拉德洛夫院士为首的专门的考察团来蒙古考察了土拉、鄂尔浑两河河谷的古物。那个考察团的工作成果被汇集在多卷本的《鄂尔浑河考察团报告集》中发表。^⑤

继拉德洛夫考察团之后，芬兰等国的考古探险队、探险家来到蒙古，^⑥ 俄罗斯的探险家们也接踵而至，考古遗物不断有新的发现。

人民革命之后，蒙古考古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蒙古人开始自己研究考古遗物。

作为现在的科学院的最初雏型的图书文献委员会建立于1921年。接着，历史研究室开始工作。历史研究室主持发掘考古遗物，收集有关情报，发布文物消息等。

从1922年起，作为考古研究的第一步，蒙古人独立进行，或有时候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进行考察研究工作。靠着蒙古图书文献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的合作和努力，我国各地的文化——历史遗物、碑铭、古墓、故城和古代要塞，有新的发现。

蒙苏学者合作进行的最初考古研究工作的一个杰出成果，就是以И.К.科兹洛夫为首的蒙藏考察团1924—1925年对于诺颜乌拉山一带的匈奴原住民的庞大的墓室所作的发掘和研究。那个考察团的研究成果被连续地发表出来。^⑦

从诺颜乌拉山的墓中出土了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绣花的毡子、缎制品、毛织的英雄像、玉石饰品、锻过的黄金等数千件东西。还出土了用整块的松木制成、深埋地下的墓室、棺椁以及陶器和粮食等。对诺颜乌拉山墓群的发掘，在蒙古考古研究史上是一件突出的大事，也是二十世纪考古学重大发掘之一。

须要指出，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进行的考古研究具有历史考古和人种考古的混合性质。这一时期，图书文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O.扎米扬、Ж.策文、H.登德布和苏联学者B.A.卡扎克维奇、C.A.康德拉特耶夫、A.Д.西木科夫、Д.Д.布基尼奇等人在蒙古考古学方面作了许多有意思的工作。这成了我国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的最初基石。

Ж.策文从1922年起会见蒙古各地的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与他们书信往来，建立广泛的联系，作了大量的探寻珍贵的文化——历史遗物的工作。^⑧ O.扎米扬“部长”亲自下乡搜集蒙古考古遗物。^⑨ 绰号“鬼子”的H.登德布，随俄罗斯学者一起工作。^⑩ 蒙古学家B.A.卡扎克维奇旅行蒙古人民共和国各地，发现了戈壁的阿勒坦山、哈勒欣河、克鲁伦河和土拉河河谷的考古遗物；并写了学术报告。^⑪ 其中对肯特省南部边区叫作赫斯格板升和敖兰板升的十七世纪遗迹所作的研究，饶有兴味。^⑫ 还有卡扎克维奇就达里冈嘎地方发现的突厥墓石人所写的第一个报告，在学术上是很有趣的作品。^⑬ 卡扎克维奇总结当时收集到的考古资料，写了一篇大型论文《从考古角度探讨蒙古史的若干问题》。^⑭

1925年，为了搞清楚И.К.科兹洛夫从诺颜乌拉山发掘出来的遗物的意义，苏联科学院派遣了一个专门的考察团来到蒙古。那个考察团在土拉河（乌兰巴托以西）流域登记和考察了九十二个墓，收集与新石器时代有关的材料，还在诺颜乌拉山发掘古墓，确

定了诺颜乌拉山的墓与公元前匈奴国时代有关。同年，著名蒙古学家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和布里亚特学者巴拉金等人在克鲁伦、土拉河发源地一带进行考察，在克鲁伦的特热勒金地方发掘了“哈撒尔故城”，认为它与十三世纪有关。同时，还在巴彦达瓦山又发掘和研究了突厥贵族的墓。^⑭

А.А.西木科夫1927年在诺颜乌拉山发掘古墓，出土了毡子的碎片、带有植物图案的锻过的金片、镀金的扁平金属马像、中国缎子的碎片，以及有汉字的漆碗等非常有意思的文物，^⑮通过对碗上汉字的解读，知道这就是公元元年中国四川省的制品。此外，А.А.阿木斯特尔达木斯卡娅和В.В.班巴耶夫等人趁收集民族学资料之便，研究考古学遗物，详细记录了克鲁伦和色楞格河流域的突厥石人等遗物。^⑯

1933—1934年，Д.Д.布基尼奇在杭爱山一带进行考古，概括地总结蒙古当时的考古研究，写成了《总报告》这样一部巨著。^⑰

科学委员会从1927年以后经常收集考古学情报，且于1935—1939年间建立地方研究机构，派遣代表常驻地方，吸收积极分子和通讯员，向他们布置工作，收集了大量各该地区考古——历史遗物方面的线索和情报。

以科学委员会历史研究室二十来年间收集的线索、情报和俄罗斯学者们从十八世纪起一百四五十年来的登记、记录的考古遗物情报为基础，1941年末开始编制《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卡片总汇》。这期间，新资料又有成倍的增加，进行了增订。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国家中心博物馆的历史——考古收藏。苏联，尤其是在苏联的布里亚特、哈卡斯地方进行的匈奴、黠戛斯时代古部落遗物的发掘和研究，对于了解和研究蒙古地方古代部落、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具有很大意义。

在蒙苏学者合作准备编写《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一卷本时，1946—1947年，С.В.吉谢列夫教授大体结束了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遗物研究概况的研究，撰写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蒙古》的有趣而又重要的论文。^⑱这是1922—1946年间24年里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在我国各地进行的蒙古考古研究的简单总结。

1948—1949年，蒙古、苏联的联合考察团在С.В.吉谢列夫教授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发掘了哈刺和林故城和哈刺八刺合孙，找到了手工业作坊、贸易集市和皇宫的残迹。^⑲那个考察团在鄂尔浑河流域发掘研究了古部落的墓葬群。^⑳其中两个分队由А.И.奥克拉德尼科夫和К.В.维亚特基娜教授领导，在我国西部各省和东部戈壁旅行，细致地考察了先前已为人知或未为人知的石器时代的居住地，增加了新发现的居住地的数目，并对它们作了研究。^㉑

1948—1949年的考古，在我国的考古研究工作中，引起了根本的转折，真正开创了以考古新资料为牢固支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古代丰富多采的历史进行研究的起端。

五十年代起，在我国考古学方面，专题的独立的研究工作，例如原始公社考古、古国（匈奴、突厥、契丹）考古、蒙古古代和中世纪城镇考古等，开始主要由革命年代里培养出来的我国青年考古学家们自己进行，有时也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合作进行。

И.斯日一敖德扎布、И.多尔济苏荣五十年代起对蒙古石器时代作了专门研究。发

表了他们的第一批著作。^{②③}

1960—1963年, H.斯日—敖德扎布和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一起, 走遍了我国几乎所有的省, 研究石器时代, 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遗物, 收集了证明蒙古地方从早期旧石器时代或人类的蒙昧期以来即有人居住的许多新资料。他们在好几个地方进行了发掘研究工作。例如, 在乌兰巴托附近、土拉河两岸、额尔德尼召一带、毛依尔图山口、南戈壁的巴彦扎格、敖聪玛尼图等地, 都进行了发掘和研究。作为这些发掘和研究的成果的有趣的著作和论文, 一直在蒙古、苏联的考古研究书刊上发表着。^{②④}除了这些以外,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家加博里同我国考古学家合作, 对于蒙古石器作了几次小规模的研究。

从科学的角度对蒙古青铜时代的遗物进行登记和阐述的工作, 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而真正在考古学方面进行研究, 则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但是对于蒙古青铜时代的研究, 做得还是很不够的。

我们掌握着1925—1965年蒙苏考古学家们在土拉、克鲁伦、鄂尔浑河流域以及戈壁的汗乌拉等地发掘的五六十方古墓中的相当数量的资料。还有集中在乌兰巴托和各省省会的博物馆里的一般青铜器遗物。

研究青铜时代资料的某些成果已开始发表。C.Б.吉谢列夫教授著的《古代蒙古》里, 阐明了国家博物馆藏品中的青铜器的特征, 首次对蒙古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情况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鉴别了它的基本性质和发展阶段。

最近, 出版了关于蒙古青铜器的专题学术论著。^{②⑤}

在我国原始公社制度史研究上, 开始了一个新的课题, 那就是对古代人刻在石岩上遗留下来的图画进行专门的研究。年轻考古学家И.多尔济从六十年代起把蒙古地方的石岩雕刻画拿来同西伯利亚等地的石岩画进行比较研究, 发表了几篇有趣的论文。^{②⑥}

И.多尔济苏荣1954—1957年对蒙古地方古国之一——匈奴的墓进行了考察和发掘, 除了诺颜乌拉山外, 还在呼尼河、色尔比的策尔格呼和土拉的嘎出日等地方发现了许多匈奴墓。И.多尔济苏荣在诺颜乌拉山和呼尼河发掘了不少匈奴贵族和平民的墓, 获得了许多新的有趣的资料。多尔济苏荣对十九世纪以来俄国和波兰学者发掘的资料进行了实物的或书面的研究, 把考古资料拿来同中国古籍中的历史记载作比较, 撰写出版了题为《北匈奴》的专著。^{②⑦}

对于匈奴墓, 除了多尔济苏荣外, 近年来匈牙利的学者们经常同我国考古学家合作进行研究。^{②⑧}

现在已经发表了一些对于匈奴的城市和城市文化问题(这些问题在匈奴社会—经济制度史上应占一定的地位)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成果。^{②⑨}

五十年代初, 蒙古考古学家们对突厥汗国时代的墓葬主要是顺便地作了少许研究。大规模的研究工作, 是H.斯日—敖德扎布等人1957年起单独地, 或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们共同进行的, 他们挖掘了突厥大臣敦欲谷和亲王阙特勤等人的著名古墓和其他许多贵族的墓, 发现了墓壁上的突厥题词和阙特勤的石雕头像等珍贵文物。^{③⑩}此外, 还新发现了写在石岩或专门的器物上的突厥文字。^{③⑪}这是突厥文字当其国家兴盛时期在蒙古地方曾经相当流行的具体证据。

从与蒙古同源的契丹兴起时起，一直到今天还留存在蒙古土地上的古代遗址，有哈刺博赫故城、清托尔盖故城、东要塞、西要塞、克鲁伦巴日斯一Ⅱ等十来处。把这些故城拿来同汉文史籍进行比较研究的工作，作于1950—1959年间。发掘表明，契丹时代的城镇在作为军事堡垒的同时，也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活动。同时也可以得知，这些城镇与周围的游牧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②

所发现的与契丹人文化有关的资料中，清托尔盖故城瓦上的文字和肯特省萨尔巴日山哈难岩上镌刻的铭文最为有趣，并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③

五十年代起，我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不少蒙古大帝国和元代时的城市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研究得较好的是中戈壁伊赫嘎扎林朝鲁附近的塔赫林乌苏和克鲁伦巴日斯一Ⅲ二者。^④考古学家们把从塔赫林乌苏获得的大车轮毂拿来同十三世纪文献（《蒙古秘史》）和探险家的旅行记中的有关报导进行比较研究，已确定这些轮毂是十三世纪及其以前的蒙古大篷车的轮毂，并认为这在科学上是很有价值的文物。^⑤通过发掘克鲁伦巴日斯一Ⅲ，找出了十四世纪末妥懽贴睦尔汗时代这座城池仓促建成而又惨遭毁灭的原因。^⑥

1961年，蒙古和民主德国的联合考察团考察了克鲁伦的“阔迭额阿剌勒”（“阔迭额阿剌勒”，意译出来，是“野岛”，“荒岛”——陈乃雄注）。从克鲁伦的河口——阿布拉嘎河的拉善德日斯，发现并挖掘了十三世纪时曾有过大片农田和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敖拉格”的驻地遗迹。^⑦并在伊赫肯特（布日汉—哈尔东）山找到了十三世纪时在布日汉—哈尔东山二次重建的塔赫尔嘎寺的建筑遗迹数处。^⑧

蒙古和苏联的考古学家们在土拉河中游——莫尔黑图、^⑨土拉河上游——萨里达格、^⑩布尔干省的哈刺博赫河（哈达桑）、^⑪呼衮塔兰山、^⑫玛尼图河、^⑬库苏古尔省的特斯河^⑭等地分别发现了好几处与十七世纪有关的，设有工事的石建筑寺院城堡。对于其中的某几处，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

七十多年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遗物的研究概况就是这样。

注释:

- ① ИК.策文:《蒙古古代研究问题》。见《新镜》,1936年第2期。
C.B.吉谢列夫:《古代蒙古》。见《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类),1947年第4卷第4期。
《蒙古考古集》。1962年,莫斯科。
《科学与技术》杂志。1958年第2期。
- ② 《北蒙古》II。1926年,莫斯科。
- ③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1954年(蒙文版实为1955年出版——陈乃雄注),乌兰巴托,第14页。
- ④ 《鄂尔浑河考察团报告集》。第一、二、三、四卷。1892—1899年,圣彼得堡。
- ⑤ 例如探险家汉斯·勒德尔1892年后曾数度来蒙进行考古学和人种学研究。
- ⑥ K.科兹洛夫:《北蒙古·诺颜乌拉的古物》。见《与科兹洛夫的蒙藏考察团有关的北蒙古考察团简报》。1925年,列宁格勒。
- A.H.伯伦什塔木:《诺颜乌拉山中发掘的匈奴墓及其历史考古意义》,见《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1947年第4期(按1954年俄文版和1955年蒙文版《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一卷本中均作1937年第4期 陈乃雄注)。
- C.A.帖普娄霍夫:《诺颜乌拉山的古墓发掘》。见《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
- K.C.特列维尔(按1954年俄文版和1955年蒙文版《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一卷本中均作K.B.特列维尔——陈乃雄注):《1924—1925年蒙古发掘的古物》。见《国立物质文化史专门学院通报》,1931年第9—10期。
- 《诺颜乌拉古墓中出土的纺织品的工艺研究》。见A.A.沃斯克列辛斯基、H.吉洪诺夫主编的《国立物质文化史专门学院汇报》第十一卷。
- 梅原未治:《蒙古诺颜乌拉山出土文物》。1960年,东京。(日文)
- 杭德苏荣:《诺颜乌拉山匈奴墓出土碗上题词再读》(蒙古青铜时代)。见《苏联考古学》第4卷,F.1—7,第29—34页。
- ⑦ 策文收集的资料有好几卷宗,现存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抄本库。
- ⑧ 他的旅途记录分别存国家图书馆亚洲部和国家中央档案馆。
- ⑨ ИК.策文的卷宗中有登德布收集的资料。存历史研究所手抄本库。
- ⑩ B.A.卡扎克维奇的手写总结报告见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抄本库第26、27号。
- ⑪ X.普日勒1960年解读了赫斯格板升的蒙文碑铭,作了历史——语言学的注释。(按“赫斯格板升”和“敖兰板升”意译出来分别是“部分房子”和“许多房子”——陈乃雄注)
- ⑫ B.A.卡扎克维奇:《达里冈嘎行·达里冈嘎的石雕》。1930年,莫斯科。
- H.斯日—敖德扎布1962年再度研究了达里冈嘎的石人。
- ⑬ 见《现代蒙古》,1934年第4期。
- ⑭ 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报告》。历史研究所手抄本库,第17号。后来考古学家们确定“哈撒尔故城”(“特热勒金四方城”)属于匈奴国时代。
- ⑮ A.Л.西本科夫:《关于发掘朱如木特和苏兹克特山谷中两个古墓的报告》。历史研究所手抄本库27/453号。多尔济苏荣曾蒙译发表。
- ⑯ Л.А.阿木斯特尔达斯卡娅:《关于肯特省之行的报告》。历史研究所手抄本库,第99号。
- Б.Б.班巴耶夫:《关于1927年考古旅行的报告》。历史研究所手抄本库,88/204号。
- ⑰ Л.Л.布基尼奇:《总报告》。存历史研究所手抄本库。
- ⑱ 这些材料存历史研究所。

- ①⑨ C.B.吉谢列夫：《古代蒙古》。见《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类），1947年第4卷第4期。
- ②⑩ C.B.吉谢列夫：《蒙古古城》。见《苏联考古学》1957年第2期；或见《蒙古考察团著作集》（蒙古部分）。1959年，莫斯科。
- Л.А.叶夫丘霍娃：《哈刺和林的中国古代陶器》，见《苏联考古学》1959年第3期；《蒙古的古城》，1965年，莫斯科，第9—22，123—324页。
- ②⑪ Л.А.叶夫丘霍娃：《论九世纪蒙古中部的部落》。见《苏联考古学》1957年第2期。
- ②⑫ K.B.维亚特基娜：《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文物》。见《苏联考古学》1960年第1期。
- A.奥克拉德尼科夫：《蒙古古代史新资料》。见《古代史问题》1951年第4期。
- ②⑬ H.斯日——敖德扎布：《关于蒙古新石器时代》。见《科学委员会学术论文集》（社会科学类），1956年第2期。
- 多尔济苏荣：《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石器时代研究情况》。1957年，乌兰巴托。
- ②⑭ H.斯日——敖德扎布：《论蒙古旧石器时代的划分问题》。1963年，乌兰巴托。
-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B.E.拉里切夫：《1961—1962年蒙古考古研究》。见苏联科学院ИСО第1卷第1期，第80页。
- A.奥克拉德尼科夫：《蒙古原始社会》。见《苏联考古学》第3卷第8期。
- A.奥克拉德尼科夫：《蒙古古代文化研究的新情况》。见《苏联人种学》，1962年第1期。
- ②⑮ B.B.沃尔科夫：《蒙古人民共和国铜器时代文物研究史》。见《苏联考古学》，第3卷第10期。
- H.斯日——敖德扎布，Л.贡郭日苏荣：《青铜时代的中戈壁省》。见《苏联考古学》第4卷第9期。
- ②⑯ Л.多尔济：《蒙古地方石岩上的图画》，见S.H.第2卷第8期；《蒙古青铜时代的石岩画》，见《苏联考古学》，第2卷第2期。
- Л.多尔济：《蒙古石岩画研究史》。见MAC，1962年，莫斯科，第45—54页。
- X·普日勒：《泰黑日石》。1960年，乌兰巴托，第6—10页。
- ②⑰ 多尔济苏荣：《北匈奴》。1961年，乌兰巴托。
- ②⑱ H·斯日——敖德扎布：《关于蒙匈合作对古代的研究工作》。见《苏联考古学》第2卷第3期，第31—38页。
- 多尔济苏荣：《1961年对哈刺的诺颜乌拉山一带进行的考古发掘和考察》。见《苏联考古学》第卷第4期，第39—49页。
- 埃尔德利·伊斯特凡·纳旺：《1963年蒙匈联合考古调查报告》，见匈牙利《考古学通报》1965年第1期。
- 埃尔德利·伊斯特凡：《1964年蒙匈联合考古调查报告》。见《匈牙利科学》1965年第2期。
- 霍尔沃特·蒂博尔：《蒙古科学考察记》。见匈牙利《通报》第十二卷。
- ②⑲ X·普日勒：《蒙古古代和中世纪城镇简述》。1961年，乌兰巴托。
- 多尔济苏荣：《北匈奴》。1961年，乌兰巴托。
- ③⑰ H.斯日——敖德扎布：《关于蒙匈合作对古代的研究工作》。见《科学院通报》，1958年第5—6期。
- H.斯日——敖德扎布：《敦欲谷墓出土突厥题词》。见《苏联考古学》第1卷第6期。
- H.斯日——敖德扎布：《阙特勤墓出土石雕人头》。见《苏联考古学》第1卷第3期。
- H.斯日——敖德扎布：《阙特勤墓的建筑材料》。见科学杂志，1959年第5—6期。
- Л.伊斯科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文物》，见《考古年鉴》，1961年，布拉格，第13卷；《蒙古人民共和国阙特勤墓发掘记》，同上，1960年，第12卷。
- ③⑱ 那些题词中的大多数，迄今尚未解读。

- ③② 《蒙古考古集》。1962年，莫斯科。
- ③③ X.普日勒：《清托尔盖故城的有字瓦》。1959年，乌兰巴托。哈难岩的题词，尚未发表。
- ③④ X.普日勒：《蒙古古代和中世纪城镇简述》。1961年，乌兰巴托。
- ③⑤ X.普日勒：《关于“伊赫嘎扎林朝鲁”附近发现的古迹的简讯》。见《科学论文集》，1951年，乌兰巴托，第137页。（“伊赫嘎扎林朝鲁”，意译出来，是“大地方的石头”——陈乃雄注）
- ③⑥ X.普日勒：《关于克鲁伦巴日斯故城废墟的发掘和研究》。见《科学委员会论文集》（社会科学类），II，1957年，乌兰巴托，第134—141页。
- ③⑦ X.普日勒：《关于蒙古和民主德国联合考察团的工作》。见《苏联考古学》第2卷第6期，第69—70页。
- X.普日勒：《对于蒙古历史领土上某些山水的访问》。见《科学院通报》，1962年第3期，第78—82页。
- ③⑧ X.普日勒：《关于蒙古和民主德国联合考察团的工作》。见《苏联考古学》第2卷第6期，第12—72页。
- X.普日勒：《伊赫浩里格在哪里？》见《现代蒙古》第4卷第10期，第5—10页。
- ③⑨ 朝克图的察罕板升。（“察罕板升”，意译出来，是“白房子”——陈乃雄注）
- ④⑩ 萨里达格的寺院。（“萨里达格”，意译出来，是“终年积雪的高山”——陈乃雄注）
- ④⑪ 哈达桑的（洪台吉的）故城。（“哈达桑”，意译出来，是“钉子”——陈乃雄注）
- ④⑫ 塔兰乌布根寺。（“乌布根”，意译出来，是“老头儿”——陈乃雄注）
- ④⑬ 玛尼图的故城。布尔干省的贺希格温都尔县。
- ④⑭ 特斯河的苏明托尔盖故城。

二

研究蒙古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时，除了考古遗物而外，文献资料具有很大意义。关于我国历史的古老文献，在汉文中很多。

从公元前二至一世纪起，中国历朝的史书中都有专门为游牧部落列“传”设“卷”的习惯和传统。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的历史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叫做《史记》的多卷巨著，其中第110卷是专门写匈奴的。由于这位作者是在匈奴兴起时撰写自己的著作的，因此在他的记述中除了当时的事件外，还追溯和研究了匈奴原始时代的历史线索和资料。

此外，中国的历史家们还撰写和留下了许多可以充当研究匈奴史前和史后期期的文献的资料。^①

范曄的《后汉书》第120卷写的是古代鲜卑和乌桓的情况。此后的中国大部头历史书中一直有关于鲜卑的记载，保存了有关鲜卑兴盛和衰落时期的历史，主要是有关他们的政治史的资料^②。

关于鲜卑系的拓跋及其后裔魏的情况，公元六世纪的历史家魏收写有一百多卷的《魏书》。^③《北史》中还写了拓跋魏的前后历史。

关于发源于蒙古地方的柔然，公元六至七世纪的历史家姚思廉在《梁书》卷54中，唐代历史家李延寿在《南史》卷79，《北史》卷98中，十二世纪学者郑樵在《通志》卷199—200中，以及在《文献通考》卷342中，分别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记载。^④

关于曾经兴起于我国地域上的突厥、铁勒、回纥，从七世纪起，在汉文史籍中就有记述。其中有关于突厥、回纥及其同一血统的部落的报导^⑤。

关于同蒙古同源的契丹室韦以及古代真正的蒙古部落，从五至七世纪起就见于汉文史籍中。那里，有许多关于契丹室韦和奚（库莫奚）的材料。^⑥除此之外，拥有大量关于契丹部落和蒙古族古代历史报导资料的，用汉文编著的《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一直流传到今天。还用汉文出版了元代蒙古历史家脱脱为首编写的《辽史》^⑦和《金史》。这两部著作在清朝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曾由专门的官方历史家节译为满文。^⑧《辽史》的满译本曾于十九世纪翻译成欧洲文字。^⑨

利用辽、金两朝宫廷历史家们的记录中遗留下来的片断资料写成的两部著作，用汉文出版。其中包括不少关于蒙古部落同契丹、金两国互相交际、联系的材料。原著于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译成蒙文，在北京铅印出版。^⑩

十九世纪起，法、俄等国的汉学家辑录、整理上述汉文文献，将其译成欧洲语言，加上科学注释，使之成了研究者们共同的财富。一百多年来这项工作由许多学者相继进行。其中著名的有法国的汉学家阿伯尔—勒缪塞、俄国的汉学科学研究奠基者 Н. Я. 俾丘林等。俾丘林由汉文史籍中汇编并熟练地译成俄文的著作^⑪，不但被视作蒙古史的文献，而且被视作中亚古代史的文献之一。俾丘林的著作虽然最初出版于一百多年以前，但经过了长时间的岁月的考验，迄今依然具有很大的意义。

俄国和苏联的学者们从汉文史籍中摘取同蒙古历史有关的中亚古代部落和国家的史